

中国近代史丛书

# 义和团运动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中国近代史丛书

# 义和团运动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

义和团运动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编写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2.875 字数 53,000

1972年9月第1版 1972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1·1·228 定价: 0.15元

## 毛主席语录

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、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，去“杀人放火”呢？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、压迫剥削中国人民，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、贪官污吏？这是大是大非问题，不可以不辩论清楚。

中国人民，百年以来，不屈不挠、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，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，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。

## 编写说明

为了适应广大工农兵和知识青年学点历史的需要，我们编写这套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，介绍些近代史的基本知识，以供阅读参考。

这套丛书，包括重大历史事件，如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革命等，以及若干重要近代历史人物，陆续出书。每本约四万到六万字。

我们这个编写组，是由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部分同志组成的。我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有限，编写出来的东西很粗糙，甚至可能存在错误，热忱地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《中国近代史丛书》编写组

## 目 录

一、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·····	1
二、“义和团，起山东”·····	8
三、席卷京津·····	17
四、全国各地的反帝怒潮·····	25
五、八国联军的进攻·····	34
六、帝国主义策划下的“东南互保”·····	43
七、英勇抗击帝国主义侵略军·····	48
八、强盗的暴行·····	61
九、沙俄侵占东北·····	69
十、《辛丑条约》·····	74
十一、义和团的反帝革命精神万岁·····	81

## 一、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

一九〇〇年爆发的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，是一次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。这个运动是帝国主义侵略加深、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，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人民反侵略、反瓜分斗争发展的高潮。

十九世纪末年，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垄断资本阶段，即帝国主义阶段。这个阶段的特点是，“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”，<sup>①</sup>“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”。<sup>②</sup>而自甲午战争失败、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开始，亚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和分割世界的争斗，都尖锐地投向了我国，使我国陷入空前的危局。

《马关条约》中规定，日本资本家有在我国各通商口岸自行设厂制造的权利，集中反映了帝国主义输出资本的侵略要求。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的最惠国待遇，只要一国从

---

<sup>①</sup> 《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》，《列宁全集》第二十二卷，第二五九页。

<sup>②</sup> 同上书，第二四八页。

中国取得了某些侵略特权，其它各国也一律享有。因此，日本在中国取得的设厂权利，也就是帝国主义各国共享的权利。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间，帝国主义便纷纷来中国设厂，如英国的怡和纱厂、老公茂纱厂，德国的瑞记纱厂，美国的鸿源纱厂等，它们还投资开办面粉、榨油等企业。这些外国资本企业，不仅直接残酷地压榨中国的广大劳动群众，也严重地抑制了中国的民族工业。

一八九五到一八九八年，清朝政府支付日本赔款，大量举借外债。俄、法和英、德两大垄断资本集团，为了通过借款输出资本，取得特权，都向清朝政府揽（音览 lǎn）借，进行剧烈的你争我夺。清朝政府先后三次，分别向这两大垄断资本集团借款，达三万万两白银。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，折扣大，而且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，要以国家的重要收入——关税、厘金作抵，还不得一次或提前还清（这是为了防止清朝政府借债还债，使原债权国失去既得的特权），而英、德借款合同中，还规定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要职，须继续由英国人担任。所以这种借款，被称作“政治借款”。

设立银行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重要手段，这时期除原有的英、德、日等国银行急剧扩大业务外，俄国的道胜银行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，也赶忙在中国设立分行，英国的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，还合组了中英银公司。这些银行，掌握清朝政府的借款，控制清朝政府的财政，投资于铁路和矿山，并在中国吸收存款，发行纸币，操纵金融，独占外汇，成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金融垄断机构。



《马关条约》造成的另一个严重后果，是日本割占辽东、台湾等大片中国领土。俄国为了保有自己的侵略目标，曾经联络德、法两国出面干涉，迫使日本归还辽东。这样，便揭开了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领土进行大争夺的序幕，随后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，企图瓜分中国。

德国首先出马，一八九六年命令它的驻华公使，“对创造进攻的借口，特别加以注重”。一八九七年八月，德皇威廉二世访问俄国，对阴谋进占中国胶州湾，同沙皇尼古拉二世取得默契。这年十一月，恰巧有两个作恶多端的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被杀，即“巨野教案”，德帝国主义分子便兴高采烈地宣称：“现在我们有充分借口，用强硬的话来和中国大人先生们开谈判，并利用这些情况来要求割让土地，以便建立舰队所需的煤栈和港湾”，予以占领。次年，强迫清朝政府签订《胶澳租地合同》，把侵略矛头伸向整个山东。

俄国支持德国占领胶州湾，是以德国支持俄国夺取旅顺、大连为交换条件的。紧接德国占领胶州湾后，当年十二月，俄国舰队突然开进旅顺口，开始对旅大地区的侵占。德国立即表示支持，以此来报答俄国，并说“这些事情将标志着中华帝国慢慢地、逐步地瓦解”。

法国又以俄国租占旅大为借口，于一八九八年四月强占广州湾，并提出了云南、两广不得割让给其它国家的要求，幻想使这个地区和这时已成为它的殖民地的越南联成一片。

日本刚把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侵占为自己的基地，看到

西方各国纷纷在中国大陆抢分地盘，又红了眼。它在英国的支持和德国的默认下，也于一八九八年四月迫使清朝政府答应，不把台湾对面的福建割让或租让给其它国家，将福建作为它夺取的对象。

老牌的英帝国主义，当时在中国的侵略权益最大，当然不甘落后。一八九八年六、七月间，它借口抵制法国势力，在南方强租九龙半岛；又借口抵制俄国势力，在北方强租威海卫。这就不仅认为长江流域是它的独占利益，还把触角伸向了南、北两翼。

因此，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不到三年，辽阔的中国领土绝大部分都已划成了帝国主义各自的势力范围：长城以北是俄国的势力范围，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，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，福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，云南和两广的大部分是法国的势力范围。

帝国主义为了扩大资本输出，巩固并延伸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，还疯狂地夺取铁路建筑权，劫掠沿线的土地和资源。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，俄国在东北、法国在西南、德国在山东，都取得了铁路修筑权和经营权。同时，在帝国主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。

当比利时依靠俄、法集团的实力，取得芦汉铁路（芦沟桥至汉口，今京汉线）的修筑权，英国眼看俄、法势力将伸入长江流域，就向清朝政府提出了承筑铁路的庞大计划，取得津镇铁路（天津至镇江，后为津浦线）的修筑权，与俄、法抗衡。但津镇铁路要穿过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，为德国所反对，英国便拉

拢德国，约定天津至山东境内峰（音益 yì）县的一段归德国承筑，峰县至镇江的一段，归英国承筑。

美国在取得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以后不久，由于它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和西印度群岛的美西战争爆发，无力兼顾，英国乘机要求调整英、美在远东的关系，加入对粤汉铁路的投资。

英国进而想从山海关截阻俄国势力南下，极力谋取京奉线（北京到奉天，今京沈线）山海关至牛庄铁路的控制权。野心勃勃的俄国，当然不愿英国势力伸入东北，进行抵制，一八九八年英、俄达成协议，英国承认山海关至牛庄铁路受中国政府控制，不得抵押给非中国的公司。这就开了帝国主义互争不下所谓铁路“中立化”的恶例，而英国仍然取得了对这条铁路的借款权。

一八九九年四月，英、俄进一步达成分赃协议：英国不在长江流域以北要求铁路租借权，并不阻止俄国在这一地区取得特权；反过来，俄国对英国在长江流域发展侵略势力，也持同样态度。事实上就是策划瓜分。

当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、掠夺铁路权利而进行紧张的争斗中，美国由于力量不足，又忙于美西战争，没有较多地投入，虽一度想占领大沽口，无奈大沽口是华北主要通商口岸天津的吞吐口，恐为各国所不许，不敢贸然行事。等到美西战争结束，展望中国，另外已没有可以租占的港湾，也没有可供划分的势力范围，侵略成性的美帝国主义并不就此罢休，而是阴险地寻找新的侵略办法。一八九九年九月，美国

政府经过一番密谋策划，由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“门户开放”政策，即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，但各国在势力范围内不得限制它国通商、航行等活动。这就是要各国的势力范围都为美国开放，使美国的垄断资本对中国有更多的掠夺机会；另外也缓和了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得不可开交的矛盾，保持了它们暂时的侵略“均势”。然而，美国并没有放弃分占中国领土的要求，直到一九〇〇年，它还看中了福州北面的三沙湾，想据为己有，只因福建是日本的势力范围，日本坚决反对，才没有实现。

帝国主义得意忘形，叫嚷中国已经“气息奄奄”，它们准备随时肢解中国，变为它们各自的殖民地。瓜分大祸，迫在眉睫（音洁 jié）。摆在中国社会各阶级面前的，是任人宰割还是奋起抵抗？各阶级都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。

清朝统治者一贯推行投降主义的外交路线，大量出卖中国主权，用以换取帝国主义对他们统治地位的支持，对人民群众则进行血腥的镇压。尽管在统治权力问题上，他们与这个或那个帝国主义之间也存在一些奴才与主子的矛盾，但是指望这样的政府起来同帝国主义作斗争，那完全是梦想。

刚由地主阶级转化过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，虽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不满，对民族危机感到震惊和恐惧，但是他们同人民群众格格不入，不敢起来革命，他们宁可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壓力，幻想获得某几个帝国主义的支持，采取改良的办法来挽救危亡。事实证明，这条道路完全是走不通的，所以一八九八年的维新变法，只是昙花一现就破产了。

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已开始聚集力量，准备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朝政府，但是他们的力量还很小，对人民群众又很轻视，根本看不到蕴藏于农民群众中的伟大革命力量。同时，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没有认识，也有某些幻想，所以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样不可能担当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任务。

那时中国的工人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。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自动组织起来，英勇地抗击万恶的帝国主义。他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深深感受到帝国主义的沉重压力。甲午战争以后，清朝政府为了偿付巨额的赔款和外债，进一步加紧了对人民的搜括；特别是早就入侵中国的传教士，深入城乡各地，到处建立教堂，恃强逞凶，对中国人民制造了无数暴行，更使他们忍无可忍。因此，从六、七十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反洋教斗争，这时普遍地高涨起来。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，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江西、江苏、山东等省，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反洋教斗争。一八九八年，广西天地会起义和四川大足县的农民起义，发出檄（音习 xī）文，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，要求一致对外，驱逐外国侵略者。全国各地反洋教斗争的迅猛发展，预示着一场反帝斗争的革命大风暴即将来临。

## 二、“义和团，起山东”

义和团运动首先是在山东酝酿、发展起来的。当时人民群众就曾唱出“义和团，起山东”，“保国逞英雄”的民谣，歌颂从山东兴起的这一伟大革命运动。

义和团运动起于山东，不是偶然的。一八九五年后，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的狂潮中，山东处于首当其冲的地位。甲午中日战争期间，日本侵略军曾对山东半岛发动猖狂的进攻，后来又在交清赔款才能最后撤军的要求下，占领威海卫达三年之久。随后，德国强占胶州湾，英国强占威海卫，把山东两个重要港口置于它们的控制下，而德国更把整个山东划作它的势力范围。

德国以强迫清朝政府签订的《胶澳租地合同》为凭借，夺取在山东境内修筑铁路、开采矿产等特权，一八九八年成立了山东铁路公司和青岛华德矿务公司，强修胶济铁路，掠夺沿线矿产。在修路、开矿时，又大量侵占田地，破坏水道，拆毁房屋等等。英国也在威海卫大逞淫威，自行勘划境界，圈占文登、荣成两县地方，派遣劣绅充当粮总，强迫界内农民纳粮，推行殖民统治。当地人民起来反对这些暴行，又遭到穷凶极恶的

帝国主义和清朝政府的镇压。大批农民被逐出家园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
帝国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年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，设厂制造，它们的商品更象潮水一样涌入中国市场，加速中国农村原有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的解体。农村破产，手工业者大批失业。这种情况在沿海省区更为严重。而运河沿岸地区，许多城乡人民本来是依靠运河运输和客商来往为生的，自从帝国主义在沿海强行通航以及修筑铁路后，运河的运输量大减，过去客货云集的两岸，这时呈现出一片萧条景象，大批船户、挑夫、小商小贩丧失生活来源，成为社会的失业群。

清朝政府为了偿付日本的巨额赔款，维持其统治的军费、政费又有增无已，这样，除了向帝国主义借债外，就是加紧勒索人民。一八九六年山东省的田赋银两折收钱数，超过同治年间（一八六二——一八七四年）一倍以上，加上各种苛捐杂税和贪污中饱，农民的负担就更为沉重。如一八九八年发行的所谓“昭信股票”（公债），全国总共募得近两千万两白银，在官绅的重重盘剥下，人民遭受的压榨是极为严重的。以山东的安丘县为例，县官规定：计田亩苛派，按户逼取，不许减少分厘，闹得鸡犬不宁。更由于清朝政府腐败，河工废弛，黄河连年溃决，造成北方的严重灾荒。山东仅在一八九八年一年中，大部分地区被水淹没，又有五十个州县受旱灾，灾荒吞噬（音世 shì）了无数生命财产，千百万农民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挣扎。

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先锋的传教士，配合各个帝国主义的

侵略部署，更是无孔不入，同瘟疫一样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。如英国的李提摩太、美国的李佳白、法国的樊国樑、德国的安治泰等，这些披着宗教外衣、罪恶昭彰的侵略分子，长期窜居中国，既是各个帝国主义的重要代理人，又是清朝政府的座上客，起着比帝国主义公使还要广泛和深入的侵略作用。他们搜集情报，制造侵略借口，挟制签订不平等条约，直接干涉中国内政，这时更加猖獗起来。如安治泰这个家伙是德国在山东的主教，直接受到德皇威廉二世的宠信和支持，又被清朝政府赏以二品顶戴的头衔，气焰嚣张，驾于总督、巡抚之上。当“巨野教案”发生时，他赶回德国，亲自进见威廉二世说：“这是德意志帝国在亚洲取得地位、恢复威信不再来的时机了！”怂恿出兵占领胶州湾。

帝国主义在中国境内，从通都大邑到边远的乡村，撒下了一副教堂网，这些教堂就成为一个个侵略据点。据统计，到十九世纪末年，仅山东一省就有教堂一千多所，传教士和教徒八万多人。这些传教士，在他们的主教、大主教指挥下，盗窃各种情报资料，霸占田产，逞凶杀人，包揽词讼，敲榨勒索，收买流氓歹徒入教，制造种种事故，欺压中国人民。清朝政府的大小官员，慑于帝国主义的淫威，对于所谓“民教纠纷”，总是“护教抑民”，以致“民冤不伸”。层出不穷的“教案”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。而每经一次“教案”，帝国主义就要求惩办一次“案犯”（杀害反抗压迫的中国人），勒索一次赔款，扩展一次教堂。这样，中国人民只有拿起武器来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斗争，舍此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



因此，十九世纪末年，中国人民越来越频繁的反洋教斗争，在山东大为发展。一八九六年，曹县和单县一带的大刀会掀起了反洋教斗争；一八九七年，巨野、寿张、济宁、荷（音河 hé）泽、成武等州县掀起了反洋教斗争；一八九九年，沂州、平原、肥城等地也激烈地进行反对教会的斗争。义和团的熊熊烈火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从山东燃烧起来的。

义和团原名义和拳，是带有比较浓厚神秘色彩的民间组织，它的成员以练习拳棒著称，早在十九世纪初，就在山东、河南、直隶（今河北）一带从事反清活动。虽然清朝政府对它进行了多次血腥镇压，但它的反抗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。随着十九世纪末期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，义和拳的活动也日趋活跃，斗争矛头更日益强烈地指向“犹如虎狼恶”的帝国主义，并由秘密转为公开。义和拳也改称为义和团。

义和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领导机构，它的基层组织一般是“坛”，参加者以青少年为多，还有不少妇女，青年妇女参加“红灯照”，中年妇女参加“蓝灯照”。红灯照以手提红灯为标志，是妇女中的尖兵，参加战斗，惟恐落后。义和团各起的首领有老祖师、大师兄、二师兄等称号，一般下设总办、统领、打探、巡营、前敌、催阵及哨队等名目。不论是首领还是普通拳民，都要遵守纪律，紧密团结，服从命令。

义和团的基本群众首先是农民，其次是手工业者、城市贫民、水陆运输工人、小商贩等。作战时十人为一班，为首的叫十长；十班为一个大队，为首的叫百长。打仗时都有旗帜，十人是三角小旗，百人是方形大旗，中间写一个“令”字，全军大